

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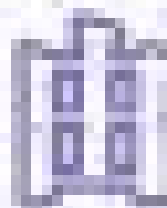
FREE TALKING FREE TALKING

交谈

· 3 ·

张志林 吴重庆 主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www.pearsoned.com.au



花
現



自由

交
谈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成都

张志林 主编
吴重庆

— 3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8) 6662959 6666766

读者朋友：凡邮购本社图书一律按书价9折，
并免付邮购费。请在汇款单附言栏内填写所购书
名、邮购册数及收书人姓名、地址，款到即寄书。
本社发行部电话：028—6666700

出版策划
责任编辑 金 平

封面设计 靖明平面设计室

版面设计 金 平

责任校对 文兴华

责任印制 徐 辉

书 名 自由交谈（第3辑） 定价 10.00 元

主 编 张志林 吴重庆 ISBN 7-5411-1760-9/I·1537

1999年1月第一版 199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数 1-10000册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27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

主 编 的 话

个人自由是社会健全的根本标志。一个健全的社会必有自由交谈的广阔空间。

本丛刊力显独立思索和真诚言说的风貌——这里没有学科之限，也无文体之拘，惟有深切的感受和无畏的探究；这里没有学术权威，也无思潮明星，惟有真知的追求者和社会的批评家。

栏目之设，皆依文稿。出版日期，随缘而定。敬请有识之士踊跃投稿。我们特别欢迎问题意识鲜明、思想交锋坦诚、论说方式独特的作品。

目 录

主编的话

82M48/20 of
'98 “龙卷风”

八十年代这样走过…………… 龙应台（1）

追踪写作风格…………… 龙应台（17）

野火秋风漫古城

——答传媒记者问…………… 龙应台（43）

面对鲁迅

人最重要的是生活

…………… 李 辉 林贤治（59）

纪念利奥塔

利奥塔与《后现代状况》的来龙去脉

…………… 伍莱德·高泽西（96）

“后现代先生”的天鹅绝唱

..... 林赛·沃特恩 (108)

现代性难题与利奥塔的异识观

..... 王 宾 (113)

建筑解码

重寻失去的所指

——康乐园主体建筑群的符号学诠释

..... 刘五宇 (145)

走进宗教世界

圣凡之际

——宗教理念及其研究二人谈

..... 龚 隽 赵汝明 (164)

难得书信

由跳迪斯科舞引发的议论

..... 项 南等 (195)

98“龙卷风”

八十年代这样走过

98
·龙·卷·风·

·龙应台·

编者按：经友人联络，《自由交谈》获刊著名旅欧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完成于近期的这篇长文。我们相信，文中所涉是台湾的区域性话题。不过，它可以给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以深思。

只是昨天

1985年12月，是个冷得不寻常的冬天，我在台北医院待产，从病床望出窗外，天空有一种特别清澈干净

的深蓝。

《野火集》出现在书店和路边书摊上。21天内印刷了24次。放到我手中的书，因为压的时间不够，封面还向上翘起。四个月之后，十万本书已经卖出。

国民党的报刊开始了几乎每日一篇的攻击：

没有了国民党的政府，谁也活不下去。就连想“闹事”的野火，到时也只有噤若寒蝉，否则就逃不过被宰的结局！

我们必须严正召告世人，今日生活在台湾，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国风民俗或有缺失，但绝对健康，绝对无梅毒恶疮，能爱也能被爱，只有龙应台这类××××，我们有权也有责任，公开唾弃她。

来自国民党以外阵营的批判则是另外一个基调：

龙应台责备读者“你们为什么不生气？不行动？”她不知道（或是故意忽略）……是什么体制使他们变成那种“令人生气”的样子？龙应台叫人们向绝大多数终生不改选的立委施加“民意”压力，这不是笑话吗？

……任何个人主义的反抗原本就是无效的……龙应台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继续秉持个人主义等美式自由，终于也不得不碰到最后的关卡：那封闭、压制、迫害个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别的，正是政治……终于，她开始攻击这政治力量，而且，

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样，遭到封杀。……然而为什么五十年代有“自由中国”，六十年代有“文星”，七十年代有“大学杂志”，而八十年代却只有一个龙应台呢？这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没落呢？

对国民党所发动的谩骂恐怖，我不曾回应过一个字，因为不屑；对其他的批评，也不曾有过一次的辩解，因为投鼠忌器；我不能让等着消灭我的人知道我的写作策略。

十三年过去了。台湾社会在十三年中脱胎换骨了，只是换出来的体质面貌和十三年前竟仍然如此相似，令人诧异不已！

1985 年何怀硕写道：

最近“江南”案与“十信”案，如狂风恶雨，几乎使社会的一切停摆……一位对此一连串事件亦曾参与决策的官员沉痛地指出：“什么叫做落后地区？差不多就像我们这个样子：交通混乱、空气污染、生态破坏、奸商欺诈、治安不宁、贪污腐化……。”

1997 年 8 月 20 日《中国时报》社论写道：

马祖空难、温妮风灾、街道巷战，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画面，一条又一条无辜性命的丧失……灾难和治安已达到了超越常理的地步，真正反映的

是整个地区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于是，当我想为八十年代的“野火现象”写下一点小小历史见证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是白头宫女在话天宝遗事，恍如隔世；倒觉得八十年代就是离我们太近太近的昨天。

我这样走过

曾经用过一个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气，气体弥漫箱内，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点燃了一根火柴，弯腰打开箱门。

“嘭”一声，不，没有爆炸。只是一团火气向我脸上扑来，一阵炙热，我眉发已焦。

1984年的台湾是一个“闷”的瓦斯烤箱，《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是一根火柴。我的社会教育开始了。激动的读者来信对我摊开了台湾社会长久遮掩的不愈伤口。一贯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是因为它有一个人生哲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而转为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但是闷啊，这是一个有冤无处伸的社会！

江南的政治谋杀、十信的金钱欺诈、玉米的食品污染都是动摇“国本”的严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小市民的个人悲剧和委曲在自生自灭。

1984年，学校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被“有关单位”

随意带走问话。台北市美术馆的公开展品可以因为有人“密告”有红色嫌疑而被涂改。在军中服役的预备军官可以被打、被杀、失踪，并遭到消息封锁。机车骑士可以掉进政府施工单位所挖的基坑致死，而得不到赔偿。

1984年，国际人权组织说，台湾有187次取缔言论事件。

不敢发出的声音、无处倾吐的痛苦，大量地涌向我这个看起来代表正义的作家案头。党外刊物在地下流窜，在边缘游走，在少数人中传阅。大多数的小市民不看、不敢看或不愿看或看不到。党外刊物的斗争意识使习惯安定、害怕动荡的小市民心存疑惧。“野火”的系列文章，是许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看见的不转弯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虽然注满感染力与煽动性，但是它超越党派、不涉权力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蕴藏着最直接的批判，人心为之沸腾。

不只是闷着的小市民，还有那已经闷“坏”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精神病患者的来信。这些信通常写得特别长，来信频率也特别高，三两天就一封，而且锲而不舍。所有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政治迫害妄想。歪歪扭扭的文字都叙述被国民党跟踪、窃听、盗邮陷害、茶中下毒、饭中下药的过程。有一个人长期给我写信谈国家大事（他也长期给里根总统和教皇写信）。有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他的名字，他因为在街头散发“反政府言论”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学生。他们的病不见得是极权统治所引起，但是国民党的极权统治深深控制着他们仅有的思维，使他们动弹不得。

正是在《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里，许多人看见了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动了，忍受的人被激励了。而我，却不再天真浪漫。眉发焦赤的同时，我已经发现这个烤箱不是单纯的泄气，它有根本的结构问题。

我开始了策略性的写作，从“难局”一文出发。

我心底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如何把自己的文章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从影响面最大的《中国时报》写到较小的《自立晚报》，再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彻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媒体中做一只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炜说：“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戒。尺度的问题我们来处理。”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戒？江南才刚刚被杀，尸骨未寒呢！我的父亲为了我夜里老在做恶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有人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都是她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同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

独立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归结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其实亦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园大学》或《台湾是谁的家》，都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党外刊物因此指责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我无法说明：这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这是信念，因为确实认为“苍蝇”责任重大，比“老虎”还大！

我写着最煽动的文字，批判的层次也逐渐升高。报社为我承受了许多“有关单位”的“关怀”电话，但是当我将美术馆馆长比作“政战官”的时候，编辑也挡不住了。“政战部”早已下过公文禁止军中读“野火”专栏和《中国时报》。现在“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要请我吃饭。

许将军温文尔雅，谦和中不失锋利。席间不知什么人建议我该称他为“许伯伯”，我笑了笑，没接腔。他看起来还真是个我觉得亲切、可爱又风度翩翩的外省长辈，但是各在各自的岗位上，不得不针锋相对。“你的文章”，他说，“是祸国殃民的。”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宴请结束之后，我写了《奥威尔的台湾》一文：

……言论控制的目的是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见官”。哪个“官”？我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后的“台湾省主席”。

宋先生偕夫人和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说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我们交换了一些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李部长”极谦逊虚心地聆听，并且作记录。

《野火集》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1986年底，我离开台湾，流传的说法是“野火”终于被“封杀”，而我被“驱逐出境”。事实上，我是由于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则是因为我在异地哺乳育儿。“野火”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风险，但并未被“封杀”。

四个月内发行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

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国民党主事者其本人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个千疮百孔的体制，但其本人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传达的社会大势走向。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1985年还代表台湾政治的主流，而在十年后全变成了非主流，退居边缘。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九十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惜竟超过了八十年代的想象力！

1987年，解严。台湾人终于赢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九十年代一一浮现。

1988年，我到莫斯科采访。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国本”，但克格勃仍旧监视着我的行踪，监视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沈昌焕“外长”则公开对媒体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会议”中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光火。

1989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风中猎猎作响的旗帜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我们不要……”。

八十年代，我从台北走到欧洲，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

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啊！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才发现那黑暗更加深不可测。这以后，我们进入了疑虑不安的九十年代，世纪之末。

任何人都可以堕落

我们，都老了十来岁。

我手边保留了五十封当年“野火”的读者来信。那位17岁的中学生，噙着眼泪写：“I fight authority, authority always wins（我抗议权威，权威总是赢），”现在怎么看这世界？那个在军校里半夜被打成重伤无处申诉的师大毕业生，现在是否活得健康？那被宪兵逮捕的精神病患者现在幻想被什么人迫害？住在淡水山坡地上、暴雨砂石将屋子裂成两半的家庭主妇，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当年写“野火”慷慨激昂、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归结于政治”的作家，现在认识些什么又学到了些什么？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只不过在八十年代的极权体制里，政治霸占了一切生活领域，因此也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国民党经过一场“木马屠城”的大换血游戏，已经不是八十年代任特务横行的政党；它是一个有民意基础的准民主政党了。民进党也不是八十年代那饱受压迫的政治异端，而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即将取而代之的